



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

——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内部征求意见稿)

胡 华



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

——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胡 华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几十年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人民服务。呕心沥血，尽粹一生。

周总理一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坚决遵守“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是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恰恰正是毛主席所最痛恨的那种“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典型人物。“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必然要把光明正大，正气凛然的周总理看作实现他们阴谋的最大障碍，他们猖狂陷害、迫害周总理，甚至强暴地禁止人民追悼和怀念周总理。他们真比蛇蝎还要狠毒，比虎狼还要残忍。但是，玩火者必自焚。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把“四人帮”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歌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因而，在今天，人民也更加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要求进一步了解周总理光辉的一生，作为自己学习的好榜样。由于近年来国内外对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和生平有不少讹传以至歪曲的报导，本文力求如实地先向大家介绍周总理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的一部分经历。

一、周总理的家世

周恩来同志，幼名大鸾，号翔宇，笔名和别号飞飞、伍豪（一

九一九年创立觉悟社，社员用数字代号名字，周恩来同志是五号，故谐音取名“伍豪”；邓颖超同志是一号，谐音取名“逸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周恩来同志又常用“少山”这个代号。在一九四七年，他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起转战陕北时，他在部队中的代号叫“胡必成”。

周恩来同志生于一八九八（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五日（阴历二月十三日）。

他的原籍是浙江绍兴。祖居在绍兴宝玉桥百岁。他与鲁迅（周树人）同宗，比鲁迅小一辈。

他家从祖父一辈起，从浙江迁居到江苏省淮安县。他就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城内驹马巷周宅中。因此周恩来同志说，他“原籍绍兴，淮安生人，江浙人也”。他的祖父叫周攀龙，号云门，先在淮安县当师爷（相当于县政府的幕僚秘书），后来升为县知事（即县长），五十多岁，死在任上。周攀龙没有置买田产，只和他的二哥周亥祥在淮安城内合买了一所住宅定居下来，这一辈亲兄弟五人，有四个做县官，都迁居在苏北淮安一带。恩来同志出生不久，祖父就亡故了，家境开始衰落下来，他记事时，家境是处在破产状态中，所以他常说自己是出身在一个破产的封建官僚家庭。

周恩来同志的父亲叫周劭纲，号攀臣（一八七四——一九四二），年轻时学当绍兴师爷（即幕僚秘书工作），没有学成，能力较差，人很老实，一生只在湖北、北京、齐齐哈尔、河北、安徽等地做过一些地方政府的收发员、办事员这类小公务员的职务，每月工资十六元、二十元，还经常失业。

父亲辈亲兄弟四人，恩来同志有一位伯父、二位叔父。伯父叫周贻夔（一八七二——一九三三），号曼青，也是学师爷出身，曾在沈阳的奉天度支部（管财政开支），当过主稿（相当于科长的师爷），

但也经常失业，除此之外，还做过吉林省财政厅的制用科长（管财政开支），他一生最高的职务是一九三二年夏在河北省民政厅任灾科长，至一九三三年病死在任上。他无子女，是周恩来同志在沈阳上小学、在天津上中学时期的实际抚养人。

大叔父周焕臣，自幼一腿偏瘫，是个残废人，三十多岁病死。小叔父刚结婚一年，二十岁上就病死，剩下小婶母孤伶一人，因无子女就把刚一岁的周恩来同志抱过去，过继给小婶母为子。这位过继母亲是周恩来同志在几岁前的一位卓越的教育者。

二、在淮安、淮阴的儿童时代（一八九八——一九一〇年） 一岁到十二岁。）

周恩来同志四、五岁时，他的过继母亲陈氏就教他背诵诗句、认字和书法。这对于他后来的那种惊人的记忆力和才华横溢的文字能力是一个最初的锻炼。

一九〇四年，恩来同志六岁时，同他父母、过继母亲及两个弟弟一家六口搬到淮阴（清江浦），和外祖父家同住，开始在外祖父家塾念书，先后读了四、五年旧书。那位童蒙老师热衷于自己考秀才，对教书很不负责。周恩来同志对塾中所教的孔老二的经书不感兴趣，过继母亲爱好古典文学，会写诗，她很支持恩来同志看小说，并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情，苦心培养他。

外祖父家藏书很丰富，幼年的恩来同志以高度广泛的兴趣博览了许多古今的小说笔记，他在同辈兄弟中以博闻强记著称。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大都是从看小说、笔记得来的。

外祖父姓万，在淮阴（清江浦）做了三十年县知事。他子女较多，恩来同志的生母是他第十二个女儿。他最喜欢她。

周恩来同志的生母十二姑，从小开朗又很精细，不肯缠足。从少

女时代起就主持万家这个正在破落的封建大家庭的家务，二十岁嫁到周家后，又主持了周家这个破落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家务。

周恩来同志在童年是父辈四房中唯一的长子，每逢过年过节，或本家、外祖父家这两个封建大家族成员中有喜庆丧吊、生日忌辰，母亲总要带着他去酬应以至排解纠纷。这些活动固然是增加了周恩来同志的社会见识，但同时也使他深深地感到孔孟播下的封建的繁文缛节必须改革，特别使他看不惯的是破落了还要装门面的旧风俗，旧习惯，借钱典当来送礼请客的虚伪作风。在他童年的心灵中，就立志要改革这些封建习俗。

周恩来同志六岁的时候（一九〇四年）从淮安搬家到淮阴（清江浦）去和外祖父家合住。到恩来同志九岁时（一九〇七年），家里已要靠借债过日子。母亲又劳累、又愁闷，得病半年就死了。父亲在外省做事，都没有来得及见到。过继母亲在愁苦中不久也死了。家里借债料理了两个母亲的丧事，家又从淮安搬到淮阴这一年内相继死了两个母亲，给恩来同志印象很深。而且家里债台高筑，要账要利息的人接踵于庭。因伯父和父亲在外做事，作为长子，恩来同志从十岁到十二岁（一九〇八——一九一〇年）不得不独立生活，处理家分。这些给幼年的恩来同志以很深的感触，他既哀悼相继失去了两个慈爱的母亲，也对黑暗的旧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了前后对比的认识，看得更深邃了。他十分痛恨孔孟封建礼教的虚伪性。

在十岁到十二岁当家的两年，他要经常跑到当铺的高柜台下拿东西典当，要去扣富人家的大门启齿借债，看够了各种面孔，这时他开始痛恨起为富不仁的富人来，使他更多地和贫穷的本家人及淮安城内贫穷的小朋友在一起，得到他们的同情，和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他从此接近了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人民。自己尝了清贫的滋味，也更多地了解到旧中国受苦受难的工农劳苦人民的生活遭遇和血泪斑斑的家

史。他深深地同情他们，思索着怎样才能根本改变这种大多数人悲惨无告的社会状况。

淮安地处淮河和运河交流处，千百年来水利不修，易遭水灾，真是十年倒有九年荒”，这两年，周恩来同志从破产的世家子弟落到了穷孩子的队伍中了。鲁迅说过：“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激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比鲁迅小十七岁，在和鲁迅相类似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周恩来同志，同鲁迅一样，成了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并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改造发展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在辽宁上小学，接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一九一〇——一九一三年，12岁——15岁）

一九一〇年夏，周恩来同志十二岁，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前夜。伯父周贻穀回乡带周恩来同志取道山东、天津到沈阳读小学。周恩来同志从此离开了淮安破落的封建大家庭。他对封建的孔孟礼教和习俗，早已厌烦，对旧家庭没有留恋。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伯父是单身在任上。周恩来同志去后，两人过着清苦的寓居生活。在小学，他受到的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教育。他在小学读书的三年，中国正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巨大变革。清庭倒塌，皇帝退位，民国肇兴。伯父和朋友们谈论着政局的变动和改革。伯父是爱国的和赞成改革的。周恩来同志在这几年进一步熟悉了不少热心改革的中西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周恩来同志对过去私塾里的腐败的和顽固守旧的封建教育一向是反感的。伴随着辛亥革命而一度风行起来的“新学”——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进取精神、革新思想，却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

他上小学不久，爆发了辛亥革命，他在学校中带头剪辫。

周恩来同志在小学三年中，不仅作文和书法每年均为全班第一，而且身体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周恩来同志在晚年回忆他到东北上小学时代的生活说：“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把身体锻炼好了，上学，冬天，夏天都要有室外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得强健了；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他说，我身体好，是跟伯父到东北以后。据他当年的同学回忆，他在寒风中跑步，做操，进行体育锻炼是很自觉的，因为他立志要救国，改革社会，觉得自己身体较文弱，不如东北同学体魄强健，所以他很注意体格和精力，不是偶然的。

周恩来同志回忆说，到东北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学会了交朋友。他说：我由南方去，大同学骂我是“小蛮子”，每天打我，欺侮我，我被打了两个月，被逼得想出办法，我也交朋友，他们再打我，我们就对打，他们就不再打我了。原来，周恩来同志看到许多小的同学也受这伙大同学的欺侮，也挨打，他就和许多弱小朋友交朋友，联合起来，团结对付大同学。这是周恩来同志用交朋友的方法，联合弱小者对付强暴者的初次胜利。

四、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习和反日、反封建帝制的社会活动 (一九一三——一九一七年，15岁——19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春夏之交，15岁的周恩来同志以优异的成绩在小学毕业，伯父送他到当时国内著名的天津南开学校(学制四年的中学)读书。南开学校的创办人是严范孙，他原是清朝的翰林，学部侍郎，较为开明，有爱国思想，主张教育救国，校长是张伯苓，是一位从美国进修回来的教育救国论者，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

南开学校在国内算是一所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教学作风比较民主的进步学校。但课业重，考试难，学费贵。总之，是一所典型的资产阶级学校。

周恩来同志考上南开后，于八月十九日报到入学。第一年编在乙三班，第二年编在丁三班，以后又编在丁二班，直到第四年毕业。

周恩来同志因家庭经济困难，交学费有困难，而他的学业成绩优异，经教师推荐，学校当局主动免去了他的学、杂费。他从入学第二年起，是全校唯一的一位免费生。

伯母姓杨（一八九一——一九四四），山东人，贫苦出身，为人耿直勤劳，心地善良。无子女，她住在天津市河北区无纬路，靠伯父寄钱和自己替人编织线袋生活。周恩来同志每星期回家一次，由她照料生活，后来，周恩来同志的两个弟弟也由她带大。上南开的四年中，周恩来同志的生活非常俭朴，每期回家时伯母给他准备了一元钱，作为一周的伙食费和书籍零用钱。一件兰布大褂，星期日回家自己洗了，当夜烤干，星期一穿上去上学。

伯母会土法治病（灸、砭、拔罐等），周恩来同志和弟弟有病时，总是伯母自己治，从没有条件请医吃药。家中经济接不上时，伯母就让恩来同志跑当铺，拿棉衣床单之类去当。或者恩来同志替学校抄写文件或刻腊版油印，来补贴饭费。那时，恩来同志常对同宿舍一位姓张的要好的同学感叹地说：“我在这里上中学，可是我的两个弟弟却在家里失学，挨饿。”青少年时代的清贫节俭生活，伯母的勤俭的美德，养成了周恩来同志一生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周恩来同志学习很用功，各门功课都很好，功课是全班第一。他在三年级时（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全校八百多名学生举行全校作文会考，他被评为全校第一名。他才思敏捷，作文不用打稿，下笔千言，在当时就为师生所称赞。

他品学兼优，但从不骄傲，而且很关心同学，帮助同学进步，善于团结同学，因此，他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

在他入学的第二年（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就和两位同学发起组织一个业余的学习和文艺的团体，叫“敬业乐群会”，取名是忠于职守，团结群众之意。这个会组织了学习“新学”的读书小组，办了一个“敬业”刊物，讨论国家大事和读书心得，有时开展课外的文艺活动。他是这个会的创始人和实际领导者，但他却很谦让，只担任副会长兼文艺部长和《敬业》刊物的总编辑，表现了他没有私心的高尚风格。这个会团结了许多进步同学。

他和毛主席正好都是一九一三年入中学的。象他们同一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经过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后，民族意识的迅速觉醒，民主主义精神的高涨，新文化运动的萌芽和成长，一代青年被卷进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毛主席和他都是这一场社会革命运动的先驱者。

他课外读书很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受到章太炎的光复会的影响，热心地读了不少清初一些强烈的民族主义学者如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和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等人的名著，培植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除了继续读一些介绍“新学”的著作如“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外，还爱读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上海办的《民权报》以及较有民主思想的天津《大公报》，也很有兴趣地读了十八、九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和严复译的《天演论》。周恩来同志的英文进步很快，他甚至能看这些书的原文以及不少英文原本的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的书。总之，当时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

他爱读中外历史书。他很穷，却渴望更多地看书学习，为了扩

大知识领域，尽量节衣缩食来买一些心爱的书，他曾买了一部连史纸精印的《史记》。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日本下最后后通牒，造成“五·九”国耻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曾在敬业乐群会上很愤慨地演说，强烈反对日本强加给我国的亡国条约。

当袁世凯称帝时，他也很气愤地发表演说激烈反对。^{有段时间，必须}他认为要宣传群众起来救国，除了文字宣传外，还必须练习演讲。他在敬业乐群会带头练习演讲。由于他锻炼出众的演说才能，南开学校两次参加天津的校际演说比赛，均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三人为代表，两次都获得第一名。

他在青年时代锻炼出来的演说才能，帮助他在以后革命斗争中即席演说的才能，这也大大地便利了他以后从事外交工作和国务活动。

他很重视化装宣传的效果，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南开中学的话剧活动。自一九一四年起，每年十月十七日南开校庆之时，他都积极参加话剧演出。用文艺化装宣传形式，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和解放妇女、破除迷信思想，发挥了他爱好文艺和戏剧的特长。那时还没有男女同台演出的习惯，同学推进他来担任女角，演出了著名的进步话剧《一元钱》（七幕剧）以及“醒”等剧。一九一五年秋，《一元钱》在南开演出比较成功，北京学界听说后，曾邀请他们到北京演出，轰动了京津，这在话剧史上也是先驱。周恩来同志一直关心和亲自抓党的文艺戏剧运动，培养和教育文艺戏剧人才。他才是真正中国文艺革命和戏剧改革的先驱者、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五、留学日本、从事爱国活动和接触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 19岁到21岁

一九一七年夏，周恩来同志十九岁，以高材生毕业于南开中学，当年秋、由天津东渡日本留学。他去留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济世的真理。他在东渡时做诗云：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也表现了他青年时代的凌云壮志和救国济世的决心。

由于家贫，他留学的经费，完全靠几位要好的同学和老师的帮助和接济，因此，他在日本的两年，生活极其艰苦，连吃肉的机会都少，常常只吃到青菜、豆腐。

他住在日本东京神田区的神保町，离中华青年会馆不远的地方。是租住在一家日本居民家里，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同住。

他上的是神田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主要是学习日文和补习大学的各门功课。该校校长是松本龟次郎，有同学三、四百人，都是中国留学生。

他在日本的两年，正是祖国处于内忧外患，十分黑暗的年代。统治国内的封建军阀，只知卖国求荣，连年混战，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灭亡中国。周恩来同志和广大留日本爱国青年一样，看透了日本的野心很大，一心要灭亡中国。他痛恨日本侵略者，痛恨军阀卖国，感到“亡国无日”、忧心如焚，他到日本的第二年，一九一八年，就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

织“兴中学生会”，以反日、反封建军阀、救国救民为职志，边学习、边从事反日爱国运动，他经常参加和领导了在神田区的中华青年会馆和附近一些中国会馆举行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人的各种反日爱国集会和宣传活动，写传单，印宣传品，在集会上发表反日反军阀演说，奔走呼吁。兴中学生的政治活动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使他没有充分时间来学习日文和温习大学的功课。他也没有别的时间到别的大学去旁听。

这时，苏俄的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影响传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广泛流传起来。京都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河上肇教授，当时是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周恩来同志当时从河上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和他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半月刊》等刊物发生了兴趣，成了热心的读者，他开始接触和接近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思想上开始一个新的萌芽的重要阶段。同时，他也从《改造》《解放》等日文杂志，看到了介绍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等的文章。

由于经济要靠同学接济，他去过京都找同学。但经济来源越来越困难。一九一九年四月，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他结束了日本学习，束装回国了。

六、领导天津五四运动和创办觉悟社，狱中斗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21岁至22岁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同志于六月间回到天津。这时，反动派百般设法破坏学生运动。七月初，天津反动政府决定各校学生提前放假，推迟开学。一部分学生觉得曹汝霖、章宗祥、陆宗兴三个卖国贼已被罢免，巴黎和约也已拒绝签字，因而，产生了松劲情绪。正在这时，周恩来同志回到了南开学校，使放假后的

冷静空气，立刻又活跃起来。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天津学联报——《联合会日刊》创刊后出版。他写了题为“革心、革新”的社论，提出改造社会和同时改造思想的主张，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这个刊物宣传必须打破孔家店的礼教思想，宣传男女平等，并经常报导国内外时事和全国各地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影响很大，日销二万份以上，成为当时天津和华北高举“打倒孔家店”旗帜的一个号角，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发展。八月间，在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下，又以《联合会日刊》为核心，成立了“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从而把天津各校宣传队伍组织和领导起来，形成一支宣传科学、民主和爱国思想，反对孔孟旧教条、迷信、独断和崇洋卖国思想的庞大宣传队伍。

斗争在进一步发展。八月间，山东发生了反动军阀马良枪杀爱国国民的惨案。周恩来同志和天津学生代表到北京请愿和示威，当北京反动政府逮捕马骏等代表时，周恩来同志一方面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积极开展营救活动。结果，动员几千学生，包围天津、北京警察厅，迫使反动派不得不释放了请愿的代表。

运动的深入，使周恩来同志的思想也更加深入一步。他在回天津的火车上，经与代表交谈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改造社会，必需求得根本解决。”

怎样根本解决呢？周恩来同志提出建议说：“要根本改造社会，就需要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不能等着腐败政府来杀戮，我们要把有这样志愿的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出版刊物来鼓吹号召，统一大家意志。”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得到代表们的赞赏。这样，“觉悟社”便应运而生了。

九月十六日，觉悟社正式成立。第一批社员计二十人，男女各

半，都是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周恩来同志在当时只有十六岁的邓颖超同志是社员中最活跃的创始人。社员用抽签办法以代号取名，周为五号（取名伍豪），邓为一号（取名逸豪）。周恩来同志在成立会上说：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中国社会要从根本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的旧道德、旧伦常全部加以剷除和改革。为了这个目的，就要结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求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群众的觉悟，来求社会的改造。

在这里，周恩来同志明确地提出了这样宏伟的目标：发动劳动民众，改造旧社会，剷除孔孟的道德、伦常，改造旧思想，改造旧教育。

觉悟社成立以后第五天（九月二十一日），李大钊同志被邀到天津讲演，并被热情地邀请到觉悟社谈话，给了社员们以很大的鼓舞。此后，社员们纷纷传诵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李大钊同志的思想和文章，给了觉悟社以很深的影响。

李大钊同志特别对觉悟社男女社员合组成一个团体作了高度的评价，因为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时旧社会受孔老二的“男女授受不亲”思想的影响，男女学校都是分开的，更没有合组小团体的事。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学生联合会也是不包括女生的（女生另组女界爱国同志会）。因此，觉悟社的这一举动，是对孔家店的一个公开的挑战。

“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使尽阴谋手段，攻击和诬蔑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反孔健将的周总理是现代的“大儒”，真是无耻之极，颠倒黑白之极。一九七四年三月，周总理在反击“四人帮”的挑衅时愤怒地指出：“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力地戳穿了“四人帮”的谎言。

五四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新旧思想均在中国流传和搏斗，但思想的主流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邓颖超同志在《五四

运动的回忆》中说：“这个团体（指觉悟社）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纪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社员们在接触和比较各种思潮的过程中，多数趋向于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其中涌现出了象郭隆真（一八九三——一九三〇年）、于方舟（一九〇〇——一九二八）这样英雄的党的烈士，涌现了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这样杰出的党的领导者。

“觉悟社”成立的时候，还决定出版刊物《觉悟》，但因接着发生请愿斗争，因此创刊号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才出版。接着又发生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的斗争，因此第二期《觉悟》虽然已收集了四十多篇文章，但未及时付印。

周恩来同志主编的《觉悟》第一期，大三十二开本，一百余页，将近十万字。《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两篇纲领性的短论，均为周恩来同志执笔。《觉悟的宣言》中说：“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线、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这是一篇反帝、反封建、反孔的宣言书。

《觉悟》第一期发表的《三个半月的觉悟社》是一篇总结性的报告，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觉悟社”有如下特点：一、组织上比较严密；二、初步使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三、充分发挥了民主精神。

也就是在觉悟社成立的时候，一九一九年九月，南开学校设立大学班（此后才分别称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周恩来同志进入

南大学习。现在从《历届学生毕业册》上，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的注册号是六十二号，写明“于民国八年九月入学”。周恩来同志入南大后，并不是死读书，而是重视实践，更为积极地从事革命斗争。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南开大学念了不到一年的书。”我是南大挂了名，^{因兵祸}被迫害未读多少书。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在群众的压力下，于一九一九年六月间拒签和约，日本又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要求，北京卖国政府也准备同意“直接交涉”。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如火如荼地反对“直接交涉”，抵制日货的运动。反动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弟弟）鉴于学生在运动中的重大作用，又命令在天津的教育厅长提前放假，企图再次用釜底抽薪之计平息风潮。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觉悟社骨干分子秘密集会，提出“反对直接交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的内政”、“反对提前放假”等口号，并组织日货调查团，坚决抵制日货。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天津学联调查委员会发现奸商私藏日货不报，派人前往调查。奸商竟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学生。学生和各界代表提出抗议，反动军阀竟逮捕学生代表马骏等二十四人。

自马骏等人被捕后，天津学联内外事务均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一月二十九日，他率领各校学生一千多人前往省公署提出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山东问题不得“直接交涉”；释放被捕代表，恢复学联会所（一月二十五日被军阀政府非法封闭的），不干涉人民调查日货和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省署拒不接见。周恩来同志和郭隆真同志等其他三位代表，不顾危险地从大门下空隙强行钻进。周恩来同志进去后，英勇地爬上梯子，将头伸出墙外，向广大同学庄严地表示：一定坚决斗争，不获圆满结果，誓死不归。结果，凶残的反动军阀不仅逮捕了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三位代表，而且血腥镇压集会学生，许多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造成“一·二九惨案”。当

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三位代表被押送警务处时，昂首挺胸，高呼爱国口号。这种英勇不屈的精神，受到广大群众的敬佩。

周恩来同志被捕后，率领其他被捕代表进行英勇卓绝的斗争。他们进行绝食，要求自由，要求立即开庭审讯，在警厅被迫答应“可以在院内自由活动，最近就开庭审讯”后，代表们才开始进食。周恩来为鼓舞大家斗志，教育警察排演了两出话剧：一出是表现越南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救国境》；一出是揭露土豪劣绅残民以逞的《新村正》。周恩来同志既演主角，又任导演，一些警察看后感动得流下泪来，责备自己不该迫害爱国志士。

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下午七时多，警察厅才把非法扣押两个多月的学生和代表二十一人移送检察厅。周恩来同志等在新的环境中继续组织难友们学习和斗争。他和一些代表起草公共读书法，组织了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法律、英文、日文等学习班，由代表中推选教师领导学习，每半年举行考试一次；还成立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等讨论会，周恩来同志则向代表连续讲演“马克思传”和“马克思学说”，这时的周恩来同志已在火旺的斗争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热心宣传者了。

四月二十八日是巴黎和会强行通过把青岛归于日本的日子，当日晚由周恩来同志报告青岛问题始末，会后并由他编成新闻稿送各报刊登。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同志主持了狱中难友们召开的纪念会，并报告开会意义。

一九二〇年七月，在学生们狱中狱外配合斗争下，在国内社会舆论的正义责难下，反动政府的审判厅不得不公开审理此案。七月八日是公开审理的第三天，各位代表都把积压了半年的郁愤不平，在法庭上发泄无余，其中发言最长，条理最清晰而论据又最有力的就是周恩来同志。他发言时正义凛然，而又从容不迫，审判者顿时